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1

现代早期 英国社会变迁

王晋新 姜德福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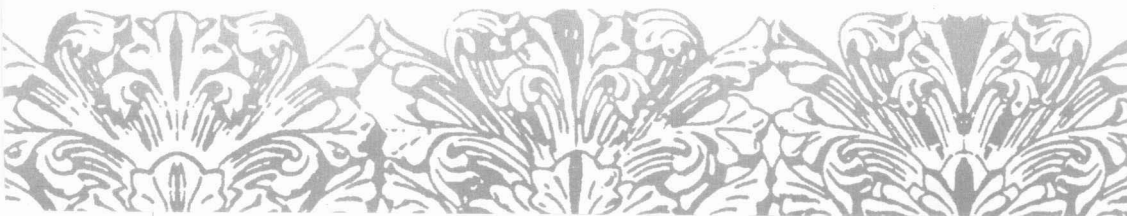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1

现代早期 英国社会变迁

王晋新 姜德福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王晋新,姜德福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3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王晋新主编)

ISBN 978 - 7 - 5426 - 2741 - 4

I. 现… II. ①王…②姜… III. 社会变迁—研究—
英国—15 世纪~18 世纪 IV. D7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588 号

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

著 者 / 王晋新 姜德福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9.5

ISBN 978 - 7 - 5426 - 2741 - 4/K · 121

定价: 34.00 元

序 论

早在1996年,笔者在拙作《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的结语中曾言:“在本书即将付梓刊行之际,我当应有所欣慰才是,然而自己心中还凝结着许多惶恐和不安。一是深感自己才思不及,书中必有诸多偏颇错误之处,恐贻笑大家;二是深知由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或转型,乃是人类社会结构的一场整体性的伟大变革,仅从农村一隅或经济结构一个层次论之,必有挂一漏万之弊。对此,笔者有深切的认识与体会。如何消弭这些不足,使己之内心得以稍安,思来想去,恐唯有埋首继续研究下去这一途径了。好在本人无论是在撰述此书的过程中,还是在赴英进修访问期间,都曾留意搜集梳理有关中英两国的社会、家庭、人口、阶级矛盾运动等诸方面史料,注意观察思辨两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前沿动态,有心从社会史的角度,在中英两国过渡时期的社会运动的层面上做些研究工作,但望能了遂此愿。”^①弹指间,10年时光匆匆而逝。扪心自问,故愿是否了结?不敢作答!

2000年末,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经教育部专家组实地考察之后,被教育部列入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行列。笔者本人与赵轶峰教授等共同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15—18世纪亚欧诸国社会结构变迁比较研究”。根据该项目启动之时的分工,笔者承担英国现代早期社会变迁研究的工作。此外,现任大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① 王晋新:《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的姜德福博士,当年正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吾等师徒二人共同组成一个小小的课题组,就现代早期英国社会的变迁问题共同进行切磋、研讨。围绕这一课题,笔者本人断断续续地写就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世界历史》、《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史学集刊》、《北方论丛》等各家学刊上。德福教授主要承担对这一历史时期英国贵族阶层的研究。数年来,他在这一领域斩获颇丰,多有成果问世,他所承担的本课题的子课题“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贵族阶层研究”的终端成果《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一书,已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出版,另尚有多篇论文也被国内各家学刊所刊发。

本书就是在我们两人以往研究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报请教育部人文社科评价中心专家组予以审批。

全书内容共计19章。依据各章所探讨对象之间的相关性,笔者将其分别列为上、中、下三篇。

第一至第五章为上篇。该篇所探讨的问题大体可分为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导致英国这种社会变革的经济基础与前提条件、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与重组、人口运动与社会转型以及现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等。

第一章: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笔者首先从时间维度着眼,对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起止时间、阶段划分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对某个历史运动或某种历史现象进行学术研究时,史学界通常的一种做法或技术习惯是,先对其进行时序上的定位和划分,其目的有二:一是力图从时间维度上准确地标示出这些“运动”、“现象”在人类历史总体进程的位置;二是在细密而科学的研究基础上,辨析这些“运动”、“现象”自身所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而达到对社会运动复杂、多样状态的整体性把握和规律性的认识。可以说,这是一种人类主体意识在时间维度上对自身历史进行思考、反省的特殊途径、手段和表现方式。学术界在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起止时限和阶段划分上多有歧见,各自殊异,前后

相差数十年、一百年甚至更多。在梳理各家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判定,即以1500年作为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开启时间,以18世纪中叶为其结束时间。其实这种“判定”并非笔者所独创,只不过是前人所作出的多种选项中一种选择而已。但是这种选择亦自有其根据缘由。笔者以为现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变迁是一种社会的整体运动过程,它关涉到构成英国社会的诸多层次、结构和方面,因而在确定其起始、终止、阶段等时间范畴时,必须以整体运动的观念来作为统摄的原则。依此原则,就不会受某种具体历史因素、事件的约束,而是将产生于不同时间的各种因素、事件、现象渐渐汇聚成一种整体性运动的时期作为我们判定时限的起点,而把这种整体性运动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质的变化效果,并建构起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结构时期作为结束或完成的时间。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英国转型变迁的过程作了三个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为1500—1640年;第二阶段为1640—1688年;第三阶段为1688—1750年(或许更晚一些)。并就三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作了简要的阐述。

本章所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从类型、过程等多种视角入手,对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进行简要评估。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同仁曾多有述说,并在英国社会变迁从其起始时间和变革内容上当属原发性、内发性的认识上,取得了一致性的认同。但是,学者们的观察角度不同,情怀各异,自然得出的观点也多种多样。笔者在此只是笼统地提出自己的某些认识:(1)跃进式的发展态势;(2)急剧性的革命与缓缓推进的改良两种方式并存;(3)内部的变革与外部的拓展紧密结合;(4)丰满而鲜明的实用主义特性。对于这些笔者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完全展开和深入辨析。至于这些看法是否妥当,尚须进一步深入探究。但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笔者以为英国社会变迁中所显现的种种独特性,皆为英国社会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的状态所作出的选择或创造,无论对于英国本国的历史进步还是对于西欧乃至世界各国的近现代进程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功用与意义,其经验或教训都值得参考、借鉴。不应以一种苛刻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一味地指责其“保守性”。但

又必须意识到上述枚举(或未枚举)的这些独特性的选择、创造是与当时那个时代英国特定的国情和社会特定的需求相吻合、相适应,它们并不具备也不应被视为具有什么“典型”或“规范”的功用与意义,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其他后发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民族所遇到的种种难症的“万能药方”。

第二章:现代早期英国社会深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以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经济活动在方式、结构、规模和效益方面的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和主体性的内容之一。故而,英国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在一定意义上是以传统农本自然经济向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经济的转型为主要内容的。英国社会经济在16至18世纪中叶期间所发生的变革,不仅以其丰富的内涵构成整个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而且也在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模上制约、统摄着英国社会变迁的运动过程和整体面貌。换言之,此一时期英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前后判若两样的巨大改观,正是由其经济结构的深刻而全面的变革所使然。所谓“深刻”是指此一时期英国社会经济在资源配置结构、经济生产组织体制、财富分配方式和经济活动空间上所发生的质的变化;所谓“全面”则是其变迁的广度,它几乎遍及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和各个门类。与同处于“原发性”行列的西欧诸国相比,英国经济变迁的这种深刻与全面的特征就显现得更为清晰。在本章中,笔者主要是从农业、工业和市场三大经济门类入手,尽量汲取当代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论及农村、城市和海外三大经济空间的变化与拓展,尽量准确地认识、评估英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内容、过程和成就,将其深刻而全面的变革特征凸显出来。

第三章:现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重组。在由以农耕为本的传统文明向以工商为本的现代文明的过渡变迁阶段,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变迁,各种社会矛盾极为激烈动荡。此种情形在16—18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显现得十分突出。对传统框架的“解构”过程与现代框架的“结构”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促动。各种社会关系在新的格局下重新组合,而且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动、重组运

动。也以自身独具的功能影响着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和总体特征。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变迁“原发性”、“原发性”的影响,英国社会结构的运动与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并给英国现代社会烙下了深深的印痕。第一,这种新的变革运动采取传统的方式进行。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整体框架不曾改变,社会结构的变革运动依旧在国王、贵族、绅士、平民等级结构的外表下进行,等级秩序依然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尊卑有序、等级森严仍是英国社会的常态。其次,社会结构的变更主要是以等级间的流动变更为主要内容。英国等级秩序在表面上对社会结构变迁遮蔽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变化成为社会结构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在保持完整的等级结构和森严的等级秩序的同时,英国的等级结构又具有相当程度的活力。

本章第二节,主要是从成分构成、经济实力、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诸层面入手,对英国贵族阶层、乡绅和普通民众三个阶层各自在社会变迁中的存在状况、时代作用等进行分析。笔者以为16世纪之后英国社会虽然动荡变迁,贵族自身也的确曾承受了种种波澜,但从总体而言,贵族阶层依然高踞在英国社会结构的上层,17、18乃至19世纪,正是英国贵族的一个鼎盛阶段。工业的勃兴、商业的繁荣、政治的动荡造成的社会变革,只使贵族相应地发生调整,并未使其衰落。

乡绅阶层则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活力和能量,不断地显现着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并以自身所具有有教养的行为规范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18世纪中叶时,乡绅已发达为英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最大受益者阶层,同时,其经济行为也全然脱去了传统的性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经营者。正是乡绅阶层的广泛而活跃的富于变革的经济活动,推动着英国社会经济较早地完成了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变、过渡。

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变革所取得的成就是极为巨大的,正是因为如此,英国社会也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而英国普通民众正是这种沉重代价的承受者。在经济利益、政治权益重新分配、重新发牌的过程中,获得利益权势的是英国的贵族、乡绅、

富商和资本家。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却是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社会变革进步性的历史效应落到英国民众身上则是很晚的事情。

第四章:现代早期英国社会人口运动与社会转型。作为历史行为主体的人类在创造文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以繁衍方式再造着自身。人类的物质生产与人类的自身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的两大主体类型和基本内容。前者不断地拓展着文明社会的空间,维系着后者的存在、发展;后者则以自身特有的功能保障着前者在时间上的延续。二者合为一体,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界在现代初期社会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人口历史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带动了家庭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从而使转型时期英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丰满。本章旨在结合英国人口、家庭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成就,以及人口运动同英国社会变迁转型之间的关系作些探讨。从英国新人口史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成就中,笔者觉得至少可以获取两点借鉴,首先,全面认识、领会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关“物质”和“人类自身”两种社会生产的基本原理,正视人口运动在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及历史作用,予其以应有关注和研究。其次,科学地、历史地、全面地审视社会整体结构及其转化演进过程,注意挖掘、阐发经济、政治、观念等结构运动与人口运动之间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改变简单机械对应的思维方式,要将人口视为一个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可变量历史因素来加以认识和探讨,同时,又必须防止马尔萨斯理论及其变异观点的侵扰。从历史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认清“人口决定论”和人口因素无关紧要等观念的荒谬。从而将人口问题真正纳入史学特别是转型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并作出既可真实地解释以往历史过程,又可为现代社会发展所借鉴的认识与总结。

第五章:现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运动中,英国国家政权始终置身其中。它既推动或限制、规范着社会的运动,又以自身的性质、功用的变

革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统治职能的内涵与外延都开始发生转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英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变革。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国内外学术界对英国国家政权在社会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成就斐然。笔者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系在这一时期的完善、转变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丰富对现代英国社会变迁转型的整体认识。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从政治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从行政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各国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状况的重要因素。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不同的影响。

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借贷制度,两个制度合一方为完整的国家财政体系。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在英格兰银行的操作下,逐步完善,逐步地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的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证券、公债券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主要投资渠道。西方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他金融业的变革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而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庞大、有效的金

融运作机构,为英国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基本条件。

本书的中篇由第六至第十四章构成,共计9章。依据各章具体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围绕着这一时期英国社会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社会阶层——贵族所展开。先后论及了现代早期都铎、斯图亚特两个王朝在封爵事宜上所奉行的基本政策及其各自的特点与得失、现代早期英国贵族阶层的财富状况和流动情形都铎王朝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时英国社会等级性质的特征等等。

第六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封爵政策。都铎王朝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君临英国几达半个世纪之久。她励精图治,开创了都铎王朝统治最为鼎盛的时代,被世人誉为英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明君。她所奉行秉持的诸多国策,对于推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安稳、发展以绝对君主制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实力起到了十分重大的历史作用。本章从封爵政策研究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探求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方略及时代作用,以期丰富加深对处于由中世纪向现代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历史认识。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社会经济业已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整个社会面临着急剧而深刻的变革。此时英国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尤其是土地财富占有结构出现相当剧烈的变革。由此导致传统社会结构框架开始松动。社会上各种违背、僭越中世纪等级制度规范的行为和言论也纷纷出现。变革旧有社会框架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趋势。如何应对这种纷乱动荡的社会局面,既要维持传统的礼制规范不被践踏,又能顺应时局之要求,使绝对君主制统治得以正常运行,便成为伊丽莎白女王所面临的一个极为棘手又必须妥善解决的难题。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贵族等级的成员虽有所变更,但其总体规模并未出现大的变动,甚至较之亨利八世时代尚有一定缩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伊丽莎白女王所奉行的封爵政策所致。笔者认为伊丽莎白之所以对贵族等级实行严控的原因是多重的,是基于她本人对于当时时局和统治需要的深刻考虑和认识的。第一,这种政策是限制贵族政治势力过分强大这一

基本国策的必然产物。第二,这种政策是维持传统等级秩序的重要举措。第三,这种政策也是维系都铎朝廷财政状况的必要措施。

伊丽莎白女王严苛的封爵政策,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现状和运动自然有着一定的影响。首先,这种政策是特定的时代环境和伊丽莎白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政治行为相交融的产物。伊丽莎白女王最为需要的也是她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一种安稳而坚固的秩序。从这一目的出发,她制定出一整套治国方略,封爵政策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爵位贵族这一社会等级的最高层次保持稳定,她在择选新的成员时严格筛选、格外慎重,竭力不使其总体规模无端地膨胀。可以说,严格的封爵政策对于实现伊丽莎白所追求的尊卑有致的等级秩序相当有益。其次,这种政策的后果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伊丽莎白力图通过封爵政策来减缓、弥合贵族与乡绅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来维持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这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是它未能也不可能起到妥善地调控社会变革的功用。从某种意义而言,伊丽莎白女王严苛的封爵政策,仅仅是掩盖而非解决了当时英国社会变化运动所提出的需求。

第七章: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封爵政策及其后果。本章内容与前一章构成姊妹篇,仍是探讨英国王朝对于爵位分封的政策。受伊丽莎白一世严苛政策所制约的都铎王朝晚期贵族等级状况,在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伊始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在封赐爵秩上颇为慷慨大度的作派致使17世纪前半叶英国贵族等级整体规模的迅速扩展。而且,自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以来,英国的贵族等级也从未有过如此速度和如此规模的扩展。本章试图从对封爵政策的分析出发,探究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政策及其时代作用,以期丰富、加深处于变革转型时代的英国社会运动发展的整体认识。

笔者以为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所奉行的这种封爵政策是当时英国复杂的客观历史条件与最高统治集团的主观意愿两种因素相互触动所导致的产物。首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革,从1540年以后一种迫切渴望变革调整等级制度的要求已在英国社会内部逐

渐孕育成熟。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只好在封爵事务上持一种积极、宽容的姿态,才有可能尽快地避免情形的进一步恶化。其次,从政治统治角度上分析,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本身亦存在着加大爵秩封赐力度的主观动机。再次,对亲信宠臣的奖掖擢拔也是导致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加大爵秩封赐力度的一种推动因素。然而这种政策付诸实施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时代影响,却与政策的设计者们和民众的期盼全然相反。非但没有实现赢得民心、强固国本的初衷,反而演化为一场英国社会运动史中前所未有的骚乱。除了随意滥封、宠信无度之外,还发展出鬻卖爵秩这种制度化的恶政。爵位这一素来为人视为功绩、荣誉、地位之象征的神圣之物,宛如债券、股票的等价物一样被抛入伦敦金融市场,任人出售转售。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特殊的商品一旦进入市场便失去了圣洁与尊严的光彩,与其他所有的商品一样承受着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摆布,受制于产品供应——市场需求决定价格这一市场法则的支配。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在封赐爵秩上的政策对当时英国社会矛盾逐步激化,走向全面对抗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第一,这种政策对传统的秩序构成极大的破坏性冲击。在短短 40 年间就使骑士和世袭贵族的数量分别超出前期数倍以上的做法,肯定是一种过速、失度的行为。百年以来贵族等级数量结构骤然被打破,势必导致社会的极大动荡。其次,它使贵族等级的“品格”与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这种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斯图亚特王朝本身的统治基础。上层社会等级是斯图亚特王朝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力量,封爵政策本身就是培育、维护这种力量成长发展的主要工具。可自开朝不久,这一社会等级便因王朝的封爵政策之故而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从而失去支撑王朝统治的社会作用。贵族等级中新旧成员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不同爵秩之间,尤其新增设的从男爵与骑士之间的相互蔑视与嘲讽;相当一部分大贵族对以白金汉公爵为代表的新宠集团的妒嫉与争斗,这些矛盾相互触动、联结,不断卷起事端,无尽无休,使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更加低效、腐败。最为重要的是,英国贵族等级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开始与君王离心

离德,渐渐形成一种与王朝对立的政治异己力量。

第八章:都铎王权与贵族。在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认识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模糊认识:都铎王权的强大是建立在对贵族的无情打击基础上的,在强大王权的压制下,贵族处于衰弱不堪的地步。本章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试图对都铎王权与贵族的关系及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权力地位做出重新的探讨和诠释。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审慎的封爵政策、严厉打击反叛贵族和威胁王权的显贵豪族、倚赖贵族实施其对全国的统治。这些政策反映了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突出体现了都铎王权对贵族阶层的态度。虽说都铎诸王在封爵问题上奉行审慎的政策,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为证据而断然肯定都铎王权与贵族势不两立。都铎诸王从未怀疑过贵族的重要性,也从未想到要抛弃贵族的支持进行统治。

都铎时期,英国既没有一支高效专业的官僚队伍,又没有常备军。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贵族进行统治,靠他们来维持乡村的秩序,靠他们提供大量军队来镇压国内的起义和进行对外战争。现在已经证明,“即使都铎新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也绝没有消灭旧贵族,而是雇用他们在国家任职;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仍然明确认为,稳定的贵族是她的政权的基本部分。”在军事上,都铎王权同样摆脱不了对贵族的依赖。不仅要靠贵族提供兵员,而且要靠贵族来统率军队。

都铎时期是新型的王权与贵族关系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诸多变化,极大地影响着王权与贵族的关系。变化之一是,国家在贵族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都铎时期,国家权力机构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些发展为贵族开辟了崭新的前景:为贵族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机会,变化之二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贵族权力赖以建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必须放弃传统的政治行为,抛弃炫耀个人暴力的军事活动、领主与附庸的政治纽带、独霸一方的政治特权,要学会做新型的廷臣、官吏和军官。他们要通过官廷、在王室政府的体系内来行使其权力。变化之三是,国王逐渐拉大了与贵族的距离。都铎王

朝时期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被贵族承认为最高军事首领的国王摇身一变,以民族的代表出现,打起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帜,从贵族的圈子里抽身出来,成为超然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专制君主。”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必须重新认识自己与国王的相互关系,调整自己的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都铎时期贵族反叛的减少,就是这种调整和适应的一个突出表现。第四,贵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丰富多彩的生活改变了贵族的本性,他们变得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一改赳赳武夫的形象,他们的行为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贵族与王权的关系问题上,王权和贵族的持久合作不仅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特点,而且总体来说是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国家组织的主要特点。国王和贵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实际上,现代早期的多数政治进展是控制和规范双方的冲突和矛盾。同这种对话与合作并存的是在对话与合作的内容和条件即贵族在这种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上的斗争。贵族之所以能够与王权持久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贵族从君主制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许多益处。都铎时期的英国贵族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在这期间,他们的地位与作用也曾出现过动荡,但这只是调整中的必然现象,这些动荡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贵族的政治地位。

第九章:现代早期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分析。现代早期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是英国贵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现代早期英国贵族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评价。以往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对现代早期贵族的整体考察,“光荣革命”往往成为研究中的分水岭;二是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偏颇之处,尤其是对“光荣革命”前贵族富裕程度的认识。本章借鉴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整个现代早期为时间断限,从贵族的收入、支出及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比较三方面入手,全面考察其富裕程度,并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现代早期,英国贵族的经济收入出现两大变化:收入的多样化,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随着贵族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其

经济收入也呈现不同的形式。在经济收入多样化的同时,贵族的收入水平也逐渐提高。虽然在这期间也出现过暂时的下降,但其总趋势是上升的。

在整个现代早期,英国贵族的收入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中世纪几乎占据贵族全部收入的封建权益收入急剧减少,此时在贵族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微乎其微了,土地收入成为这一时期贵族收入的主要成分。与此同时,贵族的收入日益多样化,耕地与牧场的地租收入、城市房地产的租金收入、出售农产品及木材的收入、工矿业收入、官职收入、国王的各种赏赐,以及一些贵族从事商业贸易获得的收入,都成为贵族收入的组成部分。对相当一部分贵族而言,某些方面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在这一时期,贵族收入呈现上升的态势,这种上升不仅体现在土地收入上,而且体现在其他方面的收入上,对大多数贵族和多数项目而言,上升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仅依据贵族的收入尚不足以判断贵族的富裕程度,要想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还须考察贵族的支出情况。支出能力的大小和支出水平的高低,也是检验贵族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从支出情况来看,现代早期英国贵族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都远远高于中世纪贵族,这既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贵族经济收入增加和富裕程度上升的重要表现。可以说,正是以日渐雄厚的财富为后盾,贵族们才敢于一掷千金、大胆消费。

英国拥有其他欧洲国家无法匹敌的极为富有的贵族阶层。虽然贵族内部也存在富裕程度上的差异,在某个阶段贵族也遇到过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作为一个阶层,贵族在整个现代早期都是富有的,他们的富有程度尚无人能够赶得上”。直到工业革命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当然,我们也承认,贵族内部也存在富裕程度上的差异,也有经济窘困的贵族。同一个家族的富裕程度也会有很大的起伏。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贵族的财富在现代早期呈现增长态势。如果说17世纪内战之前曾有一些贵族在经济上处于败落状态,那么,“光荣革命”以后,可以说英国贵族无一不富。18世纪的贵族明显是一个极为富有的集团。在整个现代早期,除

了1580到1620年的短暂困难期,贵族设法通过增加地租收入、获得高级官职、缔结有利可图的婚姻、把握好的投资机会、谋求国王的赏赐,轻松地弥补了生活支出。这么做的结果是,18世纪的贵族仍然比其他社会阶层富有,即使上层商人也无法企及。

第十章:现代早期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 贵族阶层是16到18世纪英国社会分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等级社会的主宰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非如此,它就无法维持自身的存在。这是因为任何一个阶层群体的成员从来都不仅仅包括一些始终不变的个人,他们经常调换流动,接连不断地进进出出——出去的有上升的和下降的,每个阶层群体的成员永远是变动的。以往,学术界对16到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问题关注不够,而且大多沿袭“开放的贵族”这一传统观点。本章试图对16—18世纪英国贵族的成员流动进行分析。笔者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当时西欧诸国贵族的存在与变动状况。

英国贵族阶层不仅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成员的交流,尤其是同乡绅之间的成员交流,而且其内部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交流与变化的表现形式是:获得贵族爵位成为贵族、因家族绝嗣或被剥夺爵位而退出贵族行列、在贵族内部爵位等级上的提升或下降。经常性的、合理的成员流动,是贵族阶层进行自我调节的机制。它有助于贵族阶层保持并增加自身的生机与活力,还可以形成一种促优汰劣的机制,使得不合格者退出贵族行列,同时将新的合格者吸纳进来,从而时刻保持贵族阶层的社会优势。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中,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是此时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关注和企求的事,进入贵族行列、成为贵族更是人人向往的目标。而贵族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与社会赋予该阶层的政治功能之间的不协调,以及贵族在社会意义和生理意义上的消失,使得向上的社会流动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为那些“攀爬者”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契机。向上的成员流动有两种形式:获得爵位进入贵族阶层,晋升贵族爵位。引发向上流动的因素,或曰向上流动的途径,有积聚财富、婚姻、从政、获得国王的恩宠等。贵族成